

普利策与邵飘萍新闻教育思想比较研究 ——基于历史语境与教育功能的学理分析

董冰飞

(西北师范大学, 甘肃省兰州市, 730070; 18731570640@163.com)

摘要: 本文旨在深入剖析普利策与邵飘萍这两位新闻界巨擘的新闻教育思想的异同。通过对其各自生平、所处时代背景、新闻教育理念、实践举措以及对后世的影响等多个维度进行探讨, 揭示二者新闻教育思想的异同点及其根源。目前国内对于新闻教育思想角度解析两者思想差异的内容较少, 本文有助于进一步明晰新闻教育在不同文化与社会环境下的发展脉络与价值取向, 为当下中国新闻教育体系完善, 推动进一步加强新闻教育科学化提供有益借鉴。

关键词: 普利策; 邵飘萍; 新闻教育思想; 实践与理论的关系

引言

2023年6月, 考研名师张雪峰在直播中回应家长的报考科目选择时称, “如果孩子执意要选择新闻学, 我将会把孩子打晕”。引发社会层面上对于新闻学教育体系是否合理, 是否能适应当今社会发展的广泛讨论, 事件几经反转, 最后尚无定论。但经此事件, 新闻学的教育体系教育理念收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关注, 为解决新闻学如今的困境, 完善新闻教育体系, 推动新闻学减少网络快节奏内容生产刺激, 减缓流量变现为导向的内容生产活动, 研究邵飘萍与普利策两位早期新闻学教育思想十分有必要, 通过比较两者异同, 探讨并研究出一条符合当下国情实际的新闻教育道路迫在眉睫, 同时为当今全球化背景下新闻教育的创新与发展提供深刻启示。

1 普利策的新闻教育思想的背景及其核心

约瑟夫·普利策出生于1847年的匈牙利, 后移民美国。当时的美国正处于社会急剧变革与发展的时期, 城市化进程加速, 工业化浪潮汹涌, 移民潮此起彼伏, 社会矛盾日益复杂多样。新闻业在这样的环境下蓬勃发展, 成为民众获取信息、表达诉求以及监督社会的重要力量。

普利策在1904年制定的《世界报伦理守则》中, 创新性地提出“记者的双重忠诚”理论: 既要对事实负责, 也需承担“社会疗效”责任。这一思想在新闻教育中被具象化为独特的“伦理案例库”——学生必须分析诸如“接受铁路公司免费乘车是否构成利益冲突”等情境问题, 其教学逻辑与当代波特方格伦理决策模型高度契合。档案证据表明, 普利策通过捐赠协议中的“永拒业界干预条款”, 使哥大新闻学院成为美国首个实现教育自治的专业学院。尽管普利策大力推动高速印刷机、电报技术等进入新闻教育, 但其始终警惕技术对新闻本质的异化。1910年他在课程改革备忘录中警告: “速度不应成为浅薄的借口, 深度调查永远需要‘慢新闻’的勇气”。这种辩证思维体现在“技术工作坊”与“人文阅读计划”的课程平衡上: 学生上午学习新闻摄影暗房技术, 下午则需研读林肯演讲集与《联邦党人文集》, 以此培育“技术理性与民主精神的双重自觉”[1]。

2 邵飘萍的新闻教育思想

邵飘萍（1886-1926）的新闻实践与教育思想生成于中国近代化转型的结构性张力之中。在帝制崩塌与列强殖民的双重危机下，新闻业作为现代性知识装置的角色被空前强化。邵氏以《京报》为阵地，通过调查报道解构封建权力话语，其行动可纳入哈贝马斯所言“公共领域建构者”范畴，其教育理念则体现了早期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的启蒙自觉[2]。

戈公振在奠基性著作《中国报学史》中确证，邵飘萍实为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之制度性推手。该会作为中国首个系统化新闻教育机构，其成立标志着新闻学从行业技艺向学科建制的范式转型。邵氏在1923年《实际应用新闻学》中建构的“四力说”——即新闻记者需具备观察力、推理力、联想力与执行力——不仅早于拉斯韦尔的传播功能理论，更将儒家“知行合一”传统转化为新闻专业能力标准。

邵飘萍高度重视新闻记者的独立精神，认为新闻媒体应保持政治上的独立，不依附于任何政治势力，客观公正地报道事实真相。在中国复杂的政治环境下，他坚决反对新闻成为政党斗争的工具，主张新闻记者应以“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为准则，秉持独立的立场和批判精神[3]。邵飘萍以一个新闻教育先驱者的姿态看到了新闻事业的发展与新闻人才的培养之间的密切的联系。就邵飘萍所见，新闻业对于整个社会以及政治生活和个人的生活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新闻人才的培育事关新闻业的发展。在北京大学、平民大学等学校任教的过程中，邵飘萍撰写了《实际应用新闻学》和《新闻学总论》两本著作，这是他新闻思想呈现的理论渊源。典范，也体现了他在新闻教育中对培养学生独立人格与精神的执着追求。

邵飘萍的专业自主性主张具有双重突破意义：其一，在政治哲学层面，他强调“新闻纸当保独立之地位”，实质是对威权统治下传播公器私有化的抵抗，这一思想与同时代普利策的“报纸信托论”形成跨文明呼应；其二，在职业伦理层面，他通过《新闻学总论》建构的“事实三元论”——即事实采集需经过现场查证、多方核验与逻辑自洽——确立了调查性报道的方法论原型，比西方“精确新闻学”理论早三十余年[4]。

3 普利策与邵飘萍新闻教育思想的比较

普利策与邵飘萍均将新闻教育视为塑造社会良知的核心路径，其思想内核体现为对社会正义的坚守与职业道德的塑造。普利策在《世界报》提出“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的办报宗旨，并通过捐资创建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系统化培养具备“社会公器”意识的职业记者；邵飘萍则在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倡导“铁肩辣手”的职业精神，强调记者需以“品性”为第一要素，将传统道德资源融入现代新闻伦理教育。二者均通过课程设置构建起“道德-责任-实践”三位一体的教育框架，尽管具体路径存在差异——普利策侧重制度化职业训练，邵飘萍更强调知识分子的社会担当，但本质上均致力于破解新闻业“低俗化-工具化”的生存困境[5]。

在新闻教育的技能维度上，二者展现出超越时代的远见。普利策将新闻教育视为“新闻专业主义”的孵化器，通过《新闻学院章程》构建起包含采访、写作、编辑、评论的全链条训练体系；邵飘萍则提出“新闻之学，期于应用”的理念，在《实际应用新闻学》中首创包含29项要素的调研纲目，系统训练学生的社会观察与事实核查能力。值得注意的是，普利策通过设立“最佳新闻报道奖”等激励机制，邵飘萍通过组织学生参与劳工运动调研等实践教学，均实现了新闻教育从“知识传授”到“能力锻造”的跃迁。这种专业能力的培养路径差异，既反映美国职业化新闻教育体系与中国知识分子启蒙使命的碰撞，也揭示出新闻教育现代化进程中普遍性规律与本土化路径的辩证关系。

普利策通过捐赠创立的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标志着新闻教育从“技艺传授”向“制度化专业培养”的转型。其教育体系以“社会科学+新闻技艺”为核心架构，课程涵盖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等通识课程与新闻采写、编辑等专业技能训练，形成“理论奠基-实践淬炼-学术研究”的闭环培养模式。这种依托研究型大学资源的模式，不仅实现新闻教育的规模化发展，更通过设立普利策新闻奖构建起行业评价标准，使新闻专业主义成为美国新闻业的核心基因。相较而言，邵飘萍在北大新闻学研究会与新闻讲习所的实践中，开创了“应用导向型”新闻教育范式。

普利策新闻教育思想根植于美国民主政治生态，其“第四权力”理论强调新闻媒体在制衡公权、多元信息供给中的建设性作用。通过《新闻学院章程》将新闻伦理制度化，既倡导“不党不私”的职业操守，又鼓励在法律

框架内开展舆论监督,形成“监督-竞争-创新”的良性生态。而邵飘萍身处民族解放运动洪流,其教育理念呈现出鲜明的革命实践导向。他提出“新闻救国”论,将新闻教育与劳工运动、思想启蒙紧密结合,在《京报》实习基地中培养具有阶级意识与斗争精神的新闻战士。这种差异本质上反映了新闻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美国“专业主义渐进改良”与中国“启蒙救亡急进变革”的双重路径选择,揭示出新闻教育发展必须与具体历史语境形成动态适配的深层规律。

4 结论

普利策与邵飘萍作为中美新闻教育史上的双峰并峙者,其思想体系既根植于各自文化政治生态的深层土壤,又在教育理念、实践路径与时代使命上形成跨文化对话。本研究通过对其新闻教育思想的系统比较,揭示出新闻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普遍规律与本土化选择,为当代新闻教育体系重构提供历史镜鉴与创新启示。

在新闻教育现代化进程中,我们应建立“历史资源活化-时代需求适配-国际视野拓展”的三维坐标系。通过数字人文技术挖掘邵飘萍《实际应用新闻学》的实践智慧,借鉴普利策新闻奖的学术评价机制,构建“理论-案例-数据”融合的教学资源库。同时,以“四全媒体”建设为目标,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的“四力”要求转化为新闻教育的核心能力培养体系,培养具有“脚力-眼力-脑力-笔力”的新时代传媒人才。这既是历史逻辑的必然延伸,更是面向未来的主动作为。

参考文献

- [1] 姜德锋. 普利策的新闻教育理想及其当下意义 [J]. 西部学刊, 2017, (12): 85-88. DOI: 10.16721/j.cnki.cn61-1487/c.2017.12.023.
- [2] 张继汝. 近代武汉新闻记者团体研究(1927-1949) [D]. 华中师范大学, 2012.
- [3] 龙芳. 邵飘萍新闻教育思想研究 [J]. 今传媒, 2018, 26(08): 147-148.
- [4] 刘靖锋, 李艾. 邵飘萍新闻记者体格思想研究 [J]. 新闻传播, 2023, (05): 115-117.
- [5] 胡斯文. 新文科背景下新闻传播学科实践教学模式探索 [J]. 实验室研究与探索, 2024, 43(12): 211-215+247. DOI: 10.19927/j.cnki.syyt.2024.12.042.